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论经济学 和经济学家

[美] 罗纳德·H. 科斯 著

罗君丽 茹玉骢 译 金祥荣 审校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译库

论经济学 和经济学家

[美] 罗纳德·H. 科斯 著

罗君丽 茹玉骢 译 金祥荣 审校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美)科斯著;罗君丽,茹
玉骢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译库)
ISBN 978-7-5432-2396-7

I. ①论… II. ①科… ②罗… ③茹… III. ①经济学-
文集②经济学家-思想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1615 号

责任编辑 李 娜
装帧设计 王晓阳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美] 罗纳德·H. 科斯 著
罗君丽 茹玉骢 译
金祥荣 审校

出 版

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编辑部热线 021-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63914081
www.hibooks.cn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3
字 数 203,000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2396-7/F·753

定价:42.00 元



主编的话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

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陈昕

2014年1月1日



中文版序

我从未到过中国，考虑到我的年龄，我也不可能去了。在刚刚过去的 12 月份，我度过了自己的 99 岁生日。我很高兴自己的思想已经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为中国经济学家所检验。令我欣慰和满足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发现我的思想有助于理解他们所考察的经济问题。

最近，我一直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宁教授一起，对中国过去 30 年所发生的非凡的市场转型进行研究，这个研究成果将由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in London）出版发行。但是，很显然，如果我们试图深入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将会发生什么，那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如果这个文集的中译本有助于启发中国经济学家以正确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将会感到无比幸福。

罗纳德·H. 科斯

2010 年 1 月 2 日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



推荐序

罗纳德·H.科斯,1910年12月29日出生于伦敦郊区威尔斯敦;1929年10月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商业学士学位;1931年,科斯获得伦敦经济学院一项欧内斯特·卡赛尔爵士奖学金,在美国学习和调研一年,并形成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的主要思想和论点。由于他生性谨慎,这篇论文直到1937年才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四期)。在《企业的性质》一文完成后的整整20年中,科斯关注的是学界关于边际成本定价的争议;在此期间,他的研究都与广播垄断有关,他对真实世界中广播业专利权和垄断权的调研及精湛解释,是促成他完成另一部创世之作《社会成本问题》的重要原因和途径。1951年,科斯迁居美国,在布法罗大学获得职位,陆续发表了在详尽调查基础上的有关英国广播业垄断问题的系列论文。1958年,科斯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用近一年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随后,他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经济系,写成《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部分观点是错误的,而科斯根本不同意当时芝加哥学派所坚持的庇古观点,从而引发经济思想史上著名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之争。争论的直接结果是科斯发表了《社

会成本问题》。这是一部传世经典之作，它是上个世纪引用最多的经济学文献，与《企业的性质》一起成为科斯 199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奠基之作。

—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书，是由科斯在多个年段与多种场合的演讲稿、随笔和对多位杰出经济学家的传记性评论汇集而成的一部著作，但该书还是有一个重要主题，全书凝聚了这位伟大经济学家对古典以来主流经济学的演化、性质、方法、边界和政府管制等重大问题的看法，非常值得一读，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毋庸置疑的。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一场重要运动，即努力扩张“帝国疆域”，经济学家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律等，几乎包括整个社会科学，他们已经发展出一套政治学的经济理论，还有婚姻经济学等，自杀经济学也可能产生。这场运动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学与各个学科边界是怎样决定的？科斯给出的答案是：由竞争决定，而且这一竞争过程本质上与决定企业活动的竞争过程一样。因为对某个学科的从业者来说，他是根据是否有利可图来扩大或缩小试图回答的问题的范围。

具体分析，经济学疆域扩张有两个原因或因素。其一，经济学家越来越专注于更形式化、更工具化、更一般化的数学分析。因为数学工具的一般性给经济学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张提供了极好的手段和便利，经济学家们可以大胆地重复在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但科斯认为，工具是区别专业学术团体的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因素。典型的例子就是线性规划这样的研究工具，其他学科的学者更易于获得或掌握这样的工具。在方法上，科斯更推崇马歇尔曾经概括的经济学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也即由于人类行为的重要决定性变量都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因而经济学家能够使用“货币测量标杆”，它使经济学分析更加精确化和能够被检验。

因为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由研究对象决定，所以经济学疆域扩张和边界形成的决定因素是它的研究对象。就研究对象来说，经济学家的兴趣范围不断扩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广义化，经济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定义为“人类选择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人类所有的目的性

行为。“经济人”最大化的不再仅仅是货币收入、物质享受等纯粹的经济利益,而是明确地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货币测量标杆”度量的利益。经济学家通过把经济学解释经济体系运行的最基本假设扩展到对个人面临所有非经济领域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的解释中,从而把经济学变为解释人类所有目的性行为和选择的一种普遍理论。针对这种态势,尽管科斯也认为“在经济体系、法律或政治体系中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所以,其行为从广义上来说应该是相似的”,但他特别强调,“这决不意味着经济学家所发展起来的用于解释经济体系中的人类行为的理论或方法就可以一成不变地移接到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因为在不同领域,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当人们作出选择时,所处的制度结构也是不同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经济体系如何运行,也即制度。甄别和理解人们追求的目标和所处的制度结构的专业化理论,是其他学科的学者难以掌握的,而这一理论也适合分析社会制度的其他关联特征。因此,科斯断言,关于社会制度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影响的研究,将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永久领地。

二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类选择的科学,但经济学家自己如何选择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对于这一经济学的科学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使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呈现出重大分歧,而科斯的思想和其贡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追随者的信奉。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一个理论或假设能否成为实证经济学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和一致性来检验。对弗里德曼来说,对于一种经济理论的竞争性,预言或假设的真实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简要的预言能够通过检验并与事实相比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精确度。这说明理论能用较少的投入获得对大量现象的解释,这正是经济理论竞争性的体现。但科斯认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是错误的。

科斯选择经济学理论的方法与主流实证经济学大相径庭。首先,科斯认为,可验证的预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理论旨在帮助我们理解经济体系为什么会以当前的形式运行,那么理论假设的真实性就是必要的。其次,具

有真实假设的新理论是无法按照弗里德曼的标准进行检验的。经济学家不会等到理论的预言被检验之后才作出他们选择什么理论的决定；而一项旨在揭示一个没人相信的理论会产生不正确预言的检验性研究，其收益是极低的。科斯举了哈耶克事件、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三个已被公认的牵涉经济学理论非常重要变化的事件，说明按照弗里德曼的标准选择经济理论，科学活动将瘫痪。综合上述两点，我们就不难理解科斯的结论，尝试性预言可验证的方法，并不是选择经济理论的“经济”方法；不仅“不经济”，而且可能只会无效“产出”，因为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是最重要的。

三

科斯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涉及的演说、写作及宗教信仰活动称为“思想市场”。同普通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一样，要使思想产品更加富足，我们必须运用“自利”这种人类强大的动机。因此，从规范的角度来说，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保持思想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是最有利于思想自由发展的政策。

科斯看到，在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已表现出一种褒思想市场贬商品市场的倾向，从而出现了要让思想市场自由放任、让商品市场接受政府管制的“悖论”。这种观点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约翰·弥尔顿，他的著作《论出版自由》写于1644年，远远早于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弥尔顿坚持思想市场的自由放任是至高无上的，“给我知的自由、说的自由、凭良心坦率争论的自由，这是高于一切的自由”。在科斯看来，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这两种市场的运行，大体上来说并没有很大区别，思想市场同样存在大量“市场失灵”问题，同样需要政府管制。

思想市场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主要表现在，思想产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主体都是受利益最大化支配的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是一个完全洁白无瑕的圣徒，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约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商品市场上的人如此，思想市场上行走的人也不例外。在商品市场上，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常把消费者无知和防止欺骗视为政府干预的理由。那么在思想市场上，各种出版物和政治家的演说中存在大量错误和误导性的言论，难道就不必政府干预了吗？在思想市场中，同

样存在大量的外部性问题,如传播改革和建设思想的人由此产生的利益或损害都应得到补偿,并有合适的产权制度安排。总之,科斯认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摒弃对政府在两个市场上的表现所持有的矛盾态度,而采取更为一致的观点”。

四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之际,科斯分别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作了“国富论”和“亚当·斯密论人性”的公开演讲。在这两个演讲中,科斯盛赞亚当·斯密通过一系列绝妙手笔成功造就了一个经济分析体系,在这个分析体系中,过去两百年的经济学得到了一些梳理,但还有一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许多经济学家有这样的看法,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某些不一致,雅各布·瓦伊纳把它概括为所谓“斯密问题”。在本书的这两篇演讲稿中,科斯充分发掘了这一“问题”,科斯的结论是:在亚当·斯密那里,自利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最强大动机,但绝不是唯一的动机。亚当·斯密把其他动机也包含进分析,并没有削弱而是强化了斯密关于经济体系运行要依靠市场力量的观点。科斯认为,关于人性的研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有完美的结论和统一,并不存在“斯密问题”。在《国富论》中,斯密表明人类社会完全是由自利而根本不是由什么仁慈主宰,只有自利才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础。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同样表明,仁慈或利他会影响人类的行为和经济运行,但仁慈或利他属于“私人问题”,“仁慈或爱是个人化的;它在家庭中表现得最为强烈,也可能存在于同事和朋友之间。然而,随着关系的疏远,相互之间的爱或仁慈就会减弱”,一个人穷其一生也难得博得几个人的友谊。因此,总的来说,仁慈或爱是家庭的延伸,最受影响的是家庭中的劳动分工,它在现代经济劳动分工中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要依靠仁慈或爱来提供充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是不可能的,从家庭分工、人格化交易向社会分工、非人格化交易的转变,正是传统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变的根本动力和标志。可见,科斯对“斯密问题”的“发掘”是多么精辟,使亚当·斯密关于人性学说的真谛得以重见天日。

金祥荣



译者的话

《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是199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重要的科斯论文集。文集中的著述保持了科斯一贯的谦逊、严谨、逻辑自洽的风格,即便在考证历史人物和事件时,风格依然。在论述重大问题时,科斯巧妙地把思想的卓越和敏锐,与无可匹敌的娴熟语言融为一体,从而使读者在阅读中享受无穷的思维之乐趣,在经济学充满函数、曲线和图表的今天,我们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幸运。在翻译这些作品时,我们尽可能体现这种强烈的“科斯风格”,尽管这种努力会由于译者智识与作者之间的差异而难免令读者失望。科斯曾引用熊彼特对亚当·斯密作品的评价:“他不喜欢任何超过常识性的表达,即便头脑最愚笨的读者也能通读无碍。他娓娓道来,用细微而朴实的观察鼓励读者,使他们在阅读中一直感觉惬意。”我们想,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科斯本人的作品。

首篇《生产的制度结构》是科斯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讲词,也是理解其核心经济学思想的导航性文章。科斯说,“1937年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

把交易成本明确引入经济学分析”，“1960年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它用零交易成本的假定检验了产权，但零交易成本世界只是用来作为通向正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的垫脚石”。这两篇文章的结论都是：“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成本的世界。”科斯在演讲中表达了他的总体立场：经济学分析的基本任务是获得对生产制度结构运行的理解，为此，经济学家需要把事实存在的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学分析，研究经济体系在不同制度结构中的运行状况，进而转变思考经济政策的方式。科斯强调，在做这样的转变时，经济学家必须进行更多有意义的经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经济理论中的数学应用含有敌意。他说：“一旦我们发现了影响经济体系绩效的真实因素，因素间的复杂交互关系显然需要用数学方法来处理。”

方法论问题是社会科学和哲学中最艰涩的内容。科斯的方法论思想是他对主流经济学持续反思和批评的自然演进，其专门著述不多，也没有引起像其他经典著作那样的广泛引用和争论，诺贝尔嘉奖词也未提及他的方法论思想，但是，这并不表明它们不重要。科斯本人一直认为，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并未分享他关于经济学性质、范围和方法的思想，因此，其著作虽被广泛引用和讨论，但其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真正理解。^①本书收录的《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1981)、《经济学和相邻学科》(1975)、《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1974)、《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1974)，实际上都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中独特与新颖的分析方法和视角。这种方法论的正确性正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及信奉，也正在改变经济学家对经济学重大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在《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一文中，科斯讨论了经济学家选择理论和工具的标准问题。他对广为接受的弗里德曼关于一个理论的价值应该由它所预测的范围、精确度与一致性来判断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观点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强调预测准确性的方法论观点不仅错误而且危险。他通过经验考察和逻辑分析，指出：经济学家即使可能也不应该在预言准确的基础上选择他们的理论。因为理论的主要目的是组织我们关于世界的思考，基于理解的方法比基于预测的方法更可能产生洞见。他提倡经济学家要基于理解真实世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选择这个标准经济学家不必选择相同的理论，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偏好的理论和工具。科斯最后的论述显

得比较谨慎而务实：“我们应该调查进行学术研究的替代性制度安排的效果……看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上很可能正确的是：探讨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最佳方法就是把它转变为一个经济学问题。”

显然，对经济学家而言，除了理论标准和工具的选择外，还要考虑研究对象的选择。科斯在《经济学和相邻学科》中讨论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边界问题，即经济学家依据什么标准来决定是进入还是退出经济学的相邻学科？这个问题和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密切相关。科斯并没有简单评价经济学对相邻学科入侵行为的对错，而是通过回答长期中什么决定了学科之间的差别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他认为，学科差别的根本决定因素是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工具。因此，为了增进对本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而进入其他领域的活动会长期存在，而凭借工具优势企图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得成功的“帝国主义”行为则只会在短期内获胜，长期中必然遭到其他领域研究者的驱逐，因为工具的优势很容易被其他领域的学者通过竞争而赶超。

尽管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学只有在不受政策制定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发展得更好，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很难不和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施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对政府在市场管制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大量反思，这必然促使人们思考经济学家是以什么为依据来提供公共政策建议的。科斯在 1974 年的“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演讲中，对经济学家，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并进一步阐释了自己一贯坚持的思考经济政策的方法。

他认为，经济学家所能提供的有采纳价值的建议，往往是由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涵提炼出的一些简单真理，而人们却倾向于拒绝或忽视这些简单真理。因此，经济学家欲使其建议更值得采纳，就必须更多地获悉关于人性和真实经济体系如何运行的知识，同时，必须改变思考公共政策时夸大市场运行机制的无效而忽视政府组织所固有的无效的错误思路，着手研究政府执行政策的能力和成本，并对替代性选择进行比较分析。他赞同施蒂格勒所主张的对政府活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但对后者把研究目标过多地寄托于数理分析技术持保留态度。科斯还认为，目前导致政府管制绩效不良的最可能原因是政府做得太多，以致达到边际产出为负的阶段。因此，经

济学家不得不给出的建议就是：所有政府活动都应该被缩减，但困难在于：经济学家缺乏有关政府应承担的必要职能的信息和经验。

在《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中，科斯针对当时围绕美国第一修正案所产生的讨论，考察了知识界对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上的政府管制所持有的矛盾态度，即知识分子倾向于认为商品市场上的政府管制会改善情况，而普遍确信政府在思想市场上的表现完全不称职。他认为，这两个市场并没有根本差异，知识分子应摒弃这种矛盾态度，对政府在两个市场上的表现采取更为一致的观点，在决定与之有关的公共政策时，必须考虑相同的因素，如生产者的自利、消费者的不完全信息和管理者的不称职并受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等。同时，科斯也指出，由于每个市场的不同特征会使相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市场发挥不同的重要性，因此，适当的社会安排也应随之而变。

二

研究科斯思想的人很容易忽视他对经济思想史的贡献。事实上，通过科斯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思想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领悟那些里程碑式人物的重要思想，还可以追踪探索科斯本人的学术思想之渊源。

1976年是《国富论》出版二百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科斯作了两个演讲：“国富论”和“亚当·斯密论人性”。在第一个演讲中，科斯重点考察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市场运行和政府职能等的思想；在第二个演讲中，科斯精辟阐述了亚当·斯密的人性学说。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科斯在两个演讲中都谈到的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经济体系运行关系的精妙之处。

人们通常认为，亚当·斯密将人视为抽象的只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但科斯证明：斯密真实思想中的人类并非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斯密所描绘的人，受自爱主宰，但并非不顾及他人；能够推理，但未必以这种方式达到正确目的。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斯密问题”，即人性在经济活动中自利与在道德情感上利他的不一致。《道德情操论》中充满自爱的人类不但与《国富论》中的人类经济行为没有实质性差别，反而大大强化了《国富论》关于经济体系运行要依靠市场力量的观点。

科斯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洞察到人类仁慈和利他行为的心理基础是同情,而同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出于对他人的爱,而是出于对尊严和自己优秀品格的爱。由于同情的相应行动受其行动代价的影响,同时,人类对行为结果的感知被自我欺骗所扭曲,因此,同情反应会随着关系的疏远而变得不重要或不可能。相应地,同情心理所产生的仁慈或爱就是个人化问题,随着关系的疏远,相互之间的爱或仁慈就会减弱。在《国富论》中,斯密对经济体系运行分析的出发点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为必然。尽管家庭甚至大家族的劳动分工都可能由爱或仁慈得以维系,但维持文明生活的标准,要求广泛的劳动分工和大范围的合作,这显然没有办法通过仁慈的运行来保证。因为对大部分需要合作而彼此陌生的人来讲,很难产生相互的同情,也就根本谈不上仁慈或爱。从而,仁慈或爱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对于文明生活而言,我们只能依靠自利,通过市场来抵消仁慈的弱点和偏见,从而保证个人在产品和服务生产中的广泛合作并得到极大满足。同时,科斯也提请我们注意,斯密的著述并没有因此而忽视仁慈和道德在市场系统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迅速发展起来,杰文斯的早逝使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成为英国当时正统经济学无可争辩的领袖。作为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当时享有极其崇高的国际地位,但其复杂而神秘的性格似乎并不为同时代人所称道。

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父母》(1984)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家族和先人》(1990)这两篇文章中,科斯以质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名传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为开端,对马歇尔的父母及其直系亲属的身世进行了周密而详尽的考证和论述。他以极其缜密的思考和推理,纠正了一些流行的错误观点,让我们能够穿透历史,更加清晰地了解对伟大人物可能产生真正影响的那些人和事。结果显示:历史真相与凯恩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中的有关描述相去甚远。科斯向我们揭示了马歇尔父亲的粗暴和固执对马歇尔成年后所表现出的个性弱点应该承担的责任,并赞扬了马歇尔在恶劣家庭环境中依然能够脱颖而出的非凡个人品质。在探究马歇尔心智的家族渊源问题上,科斯微妙地批评了伟大的凯恩斯在著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传》时所采取的不恰当思维方式。凯恩斯在写作时坚持了“伟大的维

利尔斯血缘”这样的先验性假设,认为伟大人物一定有伟大的家族血缘关系,从而简单但错误地采信了一些口头传说,即“马歇尔家族发轫于西部牧师之家”。当然,科斯考证的结果也证明确实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家族血缘影响,但这种来自祖母方面的重要渊源恰恰被忽略,其原因在于马歇尔为了夸大其家族的社会地位而试图隐藏失败的祖父。虽然科斯没有直接批评凯恩斯在采用信息时未进行仔细甄别和考证,但他已经表明: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大人物会在假设的前提下,理所当然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多么深远。

1908年的马歇尔继任者选举是一个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历史事件。当时最强有力的候选者是福克斯韦尔,他1868年被选举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术成员,1881年接替杰文斯成为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仍保留圣约翰学院的学术成员资格。他是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第一批学生,也是所谓剑桥历史学派的领袖之一,对剑桥大学的贡献可谓有目共睹。人们认为,直到1908年止,他都是马歇尔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马歇尔在选举前却为支持年仅30岁资历很浅的剑桥教员庇古而竭尽全力。结果,庇古当选,福克斯韦尔与马歇尔从此有了不可挽回的决裂。^②

科斯的《马歇尔继任者庇古的任命》(1972)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他以大量翔实有力的事实揭示了这一事件的幕后原因和过程,令人信服地指出:马歇尔支持庇古,既与1903年关税改革引发的争论毫无瓜葛,也不是人们所猜测的口是心非,而是依据他非常诚实地宣称的学术判断。科斯的调查表明,马歇尔与福克斯韦尔的分歧早在1908年之前就已经不断加大。马歇尔认为,福克斯韦尔在学术洞察力和作为一个教师的能力上,有着非常严重而明显的局限,其学术成果也令其远不够资格成为成功的剑桥教授席位候选人;而庇古尽管年轻,但学术成果丰厚,能力卓越,是实现他经济学理想的合适接班人。

当然,1908年的事件的确反映了马歇尔的性格:乏味、固执、自负、没有幽默感,但他绝不是无道德的阴谋家和投机者。正如凯恩斯所正确指出的,他兼具神学家和科学家的双重天性,终生致力于发展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并把它转化为一门新兴科学——经济学(economics)。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人类的贫困,改善其生活条件,进而促进人口质量和性格改善,提高人类生命水平。他支持庇古是因为坚信庇古能继承他的学术理